

现存最早的一幅绢地彩绘《北京内外城全图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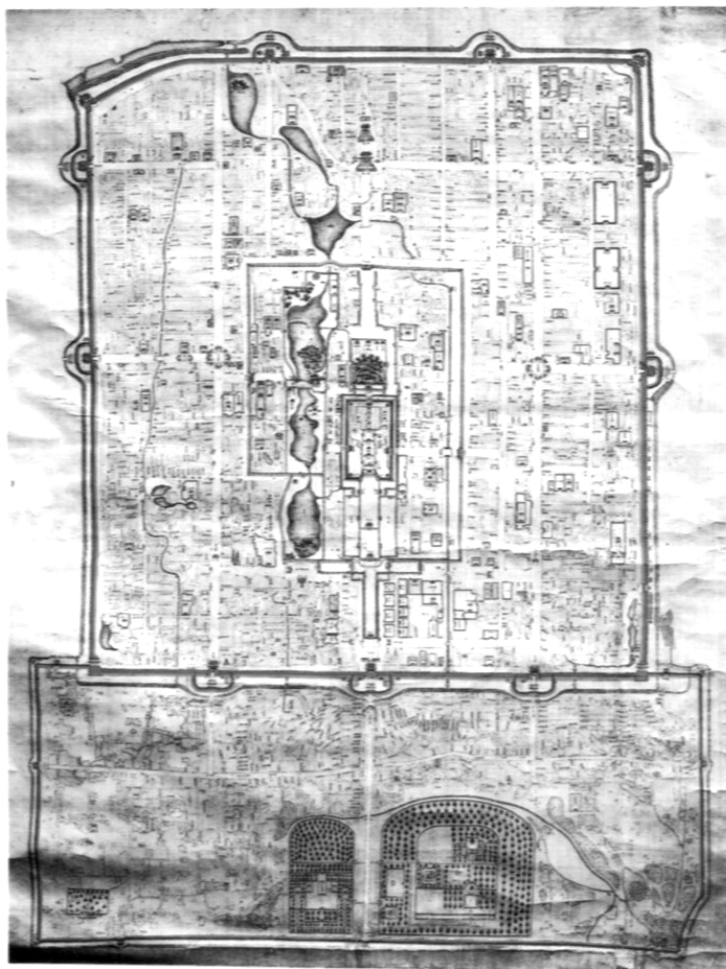
孙果清

在国家图书馆宏富的中文古典文献中有一幅《北京内外城全图》。该图是绢地彩色手绘本，图幅纵 240 厘米，横 180 厘米，方位上北下南。绘图手法采用传统的平面、立体相结合的形象画法，绘出了清中叶北京内外城的街道、胡同、河湖、桥梁的分布以及宫殿苑囿、官署仓场、王公府第、祠坛寺庙等各类建筑物的位置（见图一）。该图绘成后，一直深藏库中，秘不示人。因此，该图保存完好，色彩艳丽，是一件珍贵的地图文物。从地图内容、规模、绘制技术等方面看，它绝非出自民间艺人之手，必然是在官府的主持下，组织绘图人员、利用内务府档案资料，采用集体合作的方式绘制而成的。现就有关问题探讨如下。

一、《北京内外城全图》的绘制年代

图上未标注地图名称、作者姓名及绘制年代。现在的图名是作者根据该图的内容、范围而命名的。经详细检阅之后，发现图上所有的“宁”字，均写作“寧”字，例如：万寧寺、崇寧寺、坤寧宫、寧寿宫、广寧伯街、广寧门等。显而易见，这是因避讳清道光皇帝名字中的“宁”（宁）字所致。图中没有绘出咸丰元年（1851）所封的“恭王府”、咸丰初年签订并施工建设的各国“公使馆”和“总理衙门”、“总税务司署”等官署。由此推测，这幅图应绘于道光年间。

为了进一步弄清这幅图的具体绘制时间，现将图中绘出的部分王公府第名称提检出来，并查阅有关资料加以对照分析，以便为考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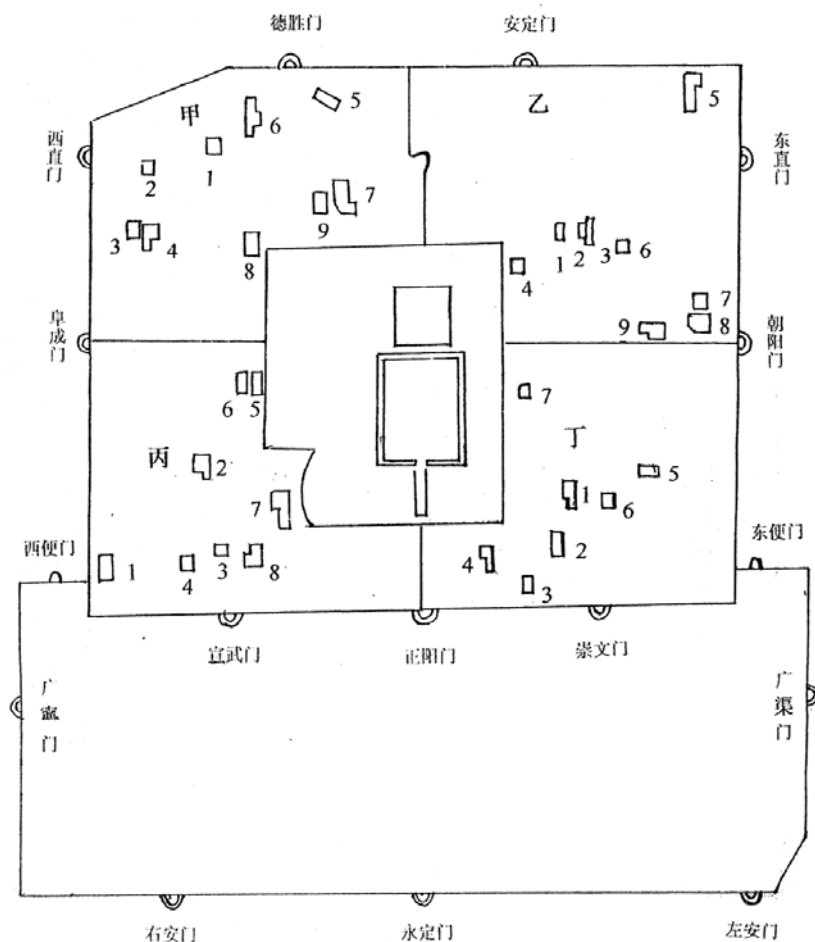
图一 北京内外城全图

这幅图的绘制年代，找到可靠的根据。

清朝，王公府第的大小有着严格的等级限制。由于受封者的住所是王室颁赐的，因此，当官位出现升降或恩宠发生变化时，其府第即有可能改换主人，所以府第的名称或宅居主人的官阶有着鲜明的时间性。图中对王公府第的名称、位置有较详细的勾绘，或画出立体的门楼，或标注出王府、公府、贝勒府等名称。这些绘有爵号的府第，表示主人仍袭有原爵位。无爵号的府第，表示其主人可能是不太受宠的王公，或其先人曾被封爵，但在这幅地图绘制时，府第的主人已不享有封爵待遇。

为便于分析，现把图中的“内城区”分成甲、乙、丙、丁四区，并将各区的府第分别加以标号（见图二）。

此外，为了便于对照，现将《乾隆京城全图》与这幅“《北京内外城全图》中王公府第坐落图”中的对应府第名称列于表一中。



图二 清《北京内外城全图》中王公府第座落图

表二

区域和编号	乾隆图上名称	本图上名称	区域和编号	乾隆图上名称	本图上名称
甲 1	贝勒球琳	十王府	乙 9	怡亲王府	栾亲王府
甲 2	恂郡王府	额駙府	丙 1	(无名)	贝子府
甲 3	慎郡王府	贝勒府	丙 2	简亲王府	王府
甲 4	果亲王府	端亲王府	丙 3	辅国公伊尔登	公府
甲 5	(无名)	成亲王府	丙 4	平郡王府	克勒郡王府
甲 6	固山贝子弘景	公府	丙 5	康亲王府	礼亲王府
甲 7	(无名)	庆郡王府	丙 6	(无名)	王府
甲 8	庄亲王府	庄亲王府	丙 7	(无名)	贝勒府
甲 9	愉郡王府	(无名)	丙 8	公府	成公府
乙 1	和敬公主府	大额駙府	丁 1	信郡王府	王府
乙 2	贝勒裴苏	进公府	丁 2	裕亲王府	公府
乙 3	和亲王府	和亲王府	丁 3	辅国公盛昌	公府
乙 4	誠亲王府	(无名)	丁 4	(无名)	贝勒府
乙 5	履亲王府	四爷府	丁 5	辅国公如嵩	公府
乙 6	愉亲王府	(无名)	丁 6	宁郡王府	贝子府
乙 7	贝子弘龙	公府	丁 7	(无名)	惠亲王府
乙 8	恒亲王府	王府			

由表一可以看出：

1. 丁 2 乾隆图上注为裕亲王府，本图上标注为公府。据《清史稿》卷一六三载，顺治第二子福全于康熙六年（1667）封裕亲王，康熙四十二年（1703）薨。后人祥瑞于嘉庆十三年（1808）袭贝子，道光十六年（1836）卒。其子继善于道光十六年（1836）袭镇国公。本图上标注为公府，显然该图绘于道光十六年（1836）以后。

2. 丁 7 乾隆图上未注名称，本图上标注为惠亲王府。据《清史稿》卷一六五载，仁宗第五子绵愉于嘉庆二十五年（1820）封惠郡王，道光十九年（1839）晋惠亲王，同治三年（1864）死。据此推知该图是绘于道光十九年（1839）以后。

3. 甲 3 乾隆图上注慎郡王府，本图上标注为贝勒府。据《清史稿》卷一六四载，康熙第二十一子允禧于雍正十三年（1735）晋慎郡王，乾隆二十三年（1758）死。乾隆第六子永瑆为嗣，永瑆于乾隆二十四年（1759）袭贝勒，乾隆五十四年（1789）晋质亲王。次年其子袭质郡王，嘉庆九年（1804）死。其孙奕琦于嘉庆十四年（1809）袭贝勒，道光十九年（1839）缘事革爵，道光二十三年（1843）死后追复贝勒。道光图以贝勒府称之，应该说，该图是绘于道光中晚期，或反映道光二十三年（1843）以后不久的事。

4. 丁 6 乾隆图上注宁郡王府，本图上标注为贝子府。据《清史稿》卷一六四载，允祥第四子弘皎于雍正受封宁郡王，弘皎第二子永福于乾隆二十九年（1764）袭贝勒。永福第四子绵誉于乾隆四十七年（1782）袭贝勒，绵誉第三子奕格于道光二十四年（1844）袭贝子。其子载敦于咸丰八年（1858）袭镇国公。可知，本图是绘于道光二十四年（1844）至咸丰八年（1858），由此推知，该图上限不早于道光二十四年（1844）。

5. 甲 7 乾隆图上未注名称，本图上标注为庆郡王府。据《清史稿》卷一六五载，永璘为高宗第十七子，乾隆五十四年（1789）封贝勒，嘉庆四年（1799）晋庆郡王，嘉庆二十五年（1820）晋庆亲王，寻死。永璘第三子绵愍于嘉庆二十五年（1820）袭庆郡王，道光十六年（1836）薨。以仪顺郡王绵志之子奕彩为嗣子，袭郡王。道光二十二年（1842）以永璘第五子镇国公绵梯承永璘嗣，旋又坐事降镇国将军，道光二十九年（1849）绵梯卒。可见此图不会晚于道光二十九年（1849）。

6. 乙 8 乾隆图上注恒亲王府，本图上标注为王府。据《清史稿》卷一六四载，康熙第五子允琪于康熙四十八年（1709）晋恒亲王。其子永皓于乾隆五十三年（1788）以恒郡王而终，以后此府改赐他人。据《京师坊巷志稿》记载，惇亲王府在此处。据《清史稿》卷一六五载，仁宗第三子绵恺于嘉庆二十四年（1819）封惇郡王，次年晋惇亲王，道光七年（1827）降郡王，道光八年（1828）复封亲王，道光十八年（1838）又降郡王，寻死，复还亲王，无嗣。由宣宗第五子奕宗继嗣，于道光二十六年（1846）袭惇郡王。道光图上标注为王府，看来，反映的是该府第主人未定爵位时的现象。那么，该图绘画时间，应在奕宗于道光二十六年（1846）继嗣之前。

综上所述，道光十六年（1836）至道光二十四年（1844）之间受封的府第，本图上已有，因此推定《北京内外城全图》的绘制时间：上限不会早于道光二十四年（1844），而下限应为道光二十六年（1846）。应该可以确切地说，此图是道光二十五年（1845）绘制的。

二、《北京内外城全图》是现存最早的绢地手绘北京城全图

北京是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。从建城到现在，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。春秋战国时期，它是燕国的都城，以后有辽、金、元、明、清五个封建王朝相继在此建都。明朝永乐元年（1403）燕王朱棣继王位，决定把都城由南京迁到北平并改称为北京。此后，北京城作为首善之区，又有过多次修扩建，形成了“凸”字形的城郭，全城由外城、内城、皇城、紫禁城四重组成。外城在内城之南，内城之内有皇城，皇城之内有紫禁城。可以推测，北京城是一座没有全部建成的四重城。遗憾的是，作为首善之区的北京城，却没有一幅明代绘制的全貌图流传下来。除了志书中所附的内容十分简略的地图外，就只有绘本《大明宫殿图》、《明北京宫殿图》和《北京城宫殿图》，而且这些都是宫殿图，不能反映北京城全貌。

现存的道光以前的清代地图为数也很有限。国家图书馆原收藏有一幅康熙中叶绘制的《皇城宫殿衙署图》，图幅纵 2.38 米，横 1.78 米，绢地彩绘，范围：北起地安门，南到大清门，东至东安门，西抵西安门。图中详细绘出宫阙、坛庙、官署、园林、街道、河池沟渠等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。该图于 1936 年被运往南京，今保存在台湾。此图只是一幅北京内城中的“皇城地图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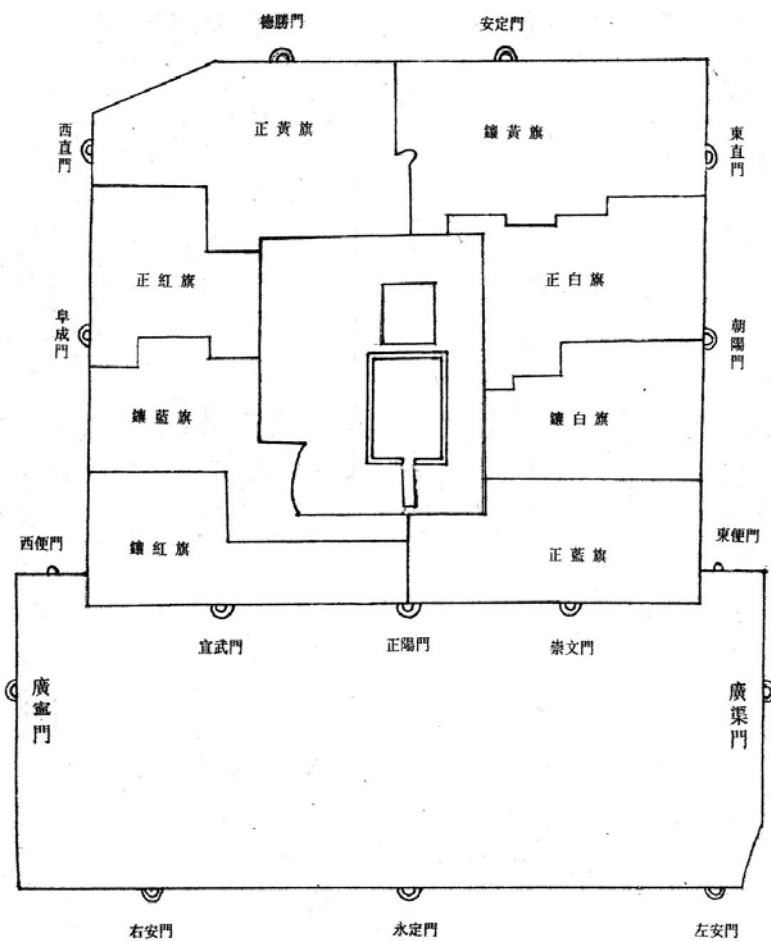
清乾隆十五年（1750）成图的《乾隆京城全图》是北京城最为精详的一幅地图，现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。该图图幅巨大，纵 14 米，横 13 米，比例尺为 1:650。国家图书馆所存该图的缩小影印本，图幅纵 2.05 米，横 2.1 米，比例尺为 1:2600，被装裱成 17 排。该图内容详细清晰，精确地表现了当时北京城的规模和城市布局，它是在实测基础上，由政府组织人力编制而成的刻本单色京城全图。

除上述几幅图外，笔者未见其他比《北京内外城全图》绘制更早的地图。因此，可以说，《北京内外城全图》是现存最早的绢地手绘地图。

三、《北京内外城全图》中的八旗各旗营戍守区域分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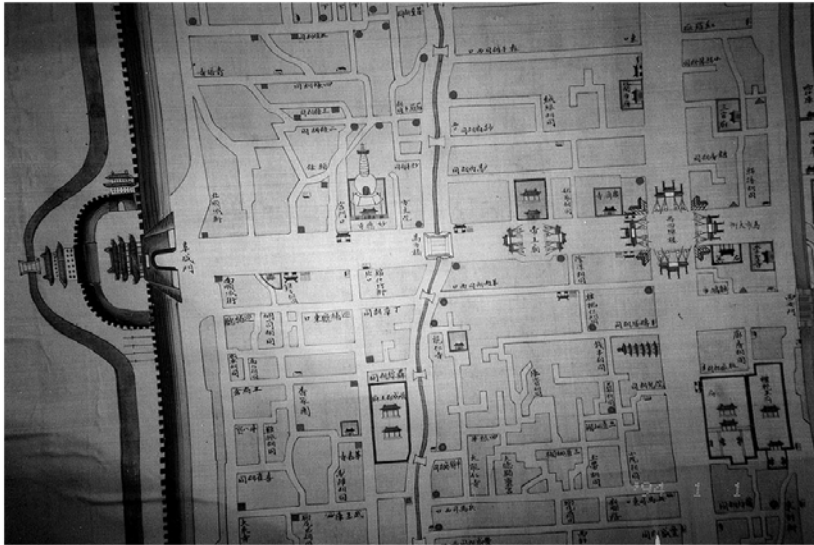
编绘地图时，因用途不同，其表现的内容自然也会有所偏重。《北京内外城全图》则着重表现了清代京城八旗各旗营戍守分布情况。

《北京内外城全图》上画有许多颜色不一的圆形、方形、三角形的几何图形符号。仔细检阅后发现，黄色代表正黄旗、白色代表正白旗、红色代表正红旗、蓝色代表正蓝旗、内黄外红代表镶黄旗、内白外红代表镶白旗、内红外白代表镶红旗、内蓝外红代表镶蓝旗。各旗的分布范围如图三所示。



图三 清《北京内外城全图》中八旗戍守分布位置图

每种颜色的图形符号又分为圆形、方形、三角形三种：圆形为满洲军、方形为汉军、三角形为蒙古军（见图四），共计 24 种标识符号。



图四 圆形为满洲军、方形为汉军、三角形为蒙古军

清初京城废除了内城坊制，并一度规定内城为满族旗人居住区，属八旗管辖。外城主要为汉族人居住区，原来内城的汉官商民，统统迁居外城。此外，清代八旗，其中各旗又包括满洲军、蒙古军和汉军，而其旗帜有着

颜色上的区别，地图上这 24 种符号的颜色，正好与清八旗的命名和旗帜色彩相对应。从分布位置来看，它们大多数位于街道、胡同的两端。

《北京内外城全图》中内城、皇城各旗戍守驻点，如表二所示。

表二 《北京内外城全图》中内城、皇城各旗戍守驻点一览表

城别	旗别	满洲军	汉军	蒙古军
内城	正黄旗	25	22	9
	正红旗	33	5	13
	正白旗	34	14	13
	正蓝旗	22	9	12
	镶黄旗	53	17	19
	镶红旗	43	14	16
	镶蓝旗	39	23	18
	镶白旗	32	15	28
皇城	正黄旗	9		
	正红旗	4		
	正白旗	6		
	正蓝旗	5		
	镶白旗	7		
	镶红旗	9		
	镶黄旗	10		
	镶蓝旗	4		

注：内城 535 处，皇城 54 处，共计 589 处。

但是，应该说明的是，京城八旗戍守营地界址与八旗居住界址不是一回事。因此这幅《北京内外城全图》上所反映的是八旗戍守，既是军队的组织，也是户籍的组织，它起着分地戍守、维持巡逻纠察、城市治安的作用。除内城街道、胡同处设有营地外，尤其是在大街和交通要道处，还设有特殊的、绘有单个立体房屋并在红木座上插有五杆长枪的标记。这无疑为官所所在地，类似出入通道的哨卡，昼夜按时开关，控制通行。

值得提出的是，从这幅京城图上还揭示了古籍中未曾披露过的信息，即镶红旗与镶蓝旗的戍守位置区域相互对调了。这是一幅官绘地图，在绘制过程中一定经过认真的校勘，决不可能出现旗址错置的差错。因为它不是只将镶红旗与镶蓝旗的戍守位置区域对调了，而是将镶红旗 3 种符号共 73 处和镶蓝旗 3 种符号共 80 处，都互相调换了位置。制图人会如此疏忽吗？回答是否定的。无独有偶，在英国 SPINK 公司收藏的一幅纸底彩绘《北京内城图》中，也出现了镶红旗与镶蓝旗互相调换了戍守位置区域的情况。对此问题，笔者认为，目前还不能轻率地说，这两幅地图的内容表示有误。或许图中绘制的镶红旗、镶蓝旗的分布位置在历史上确曾一度如此，或许是由其他什么原因造成图中表示有误。暂且作为存疑，容待今后考证研究。

四、《北京内外城全图》的价值

如上所述，《北京内外城全图》是现存最早的一幅绢地手绘北京城全图。因是手绘，则可视作孤本。该图绘制之精细，内容之丰富，字体之工整，色彩之艳丽，在北京城的地图中实属罕见，具有相当的文物价值。

《北京内外城全图》采用平面与立体相结合的方法，表现清道光年间京城城郭概貌。凡河湖、水渠均采用平面方法绘制，水面着浅绿色。紫禁城、皇城和内城的城墙、城门、门楼及部分寺观、塔院则采用立体写景法描绘。街道、胡同绘得很详细，且标注名称。展图可览京城宫殿、衙署、寺庙、王公府第等，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。

图上所绘八旗各旗营戍守分布状况更是难得的形象资料。清雍正五年（1727）鄂尔泰等奉敕纂修的《八旗通志》，没有记载京城八旗各旗营戍守情况。嘉庆初年编纂的《钦定八旗通志》，才开始记载京城八旗各旗营的数字。不过，也只能从文字上了解各旗营的多少和戍守范围，并没有记载其具体的分布位置。这幅《北京内外城全图》的价值，在于绘出了八旗各旗营的戍守位置，通过览图，即可一目了然，弥补了史籍记载之不足。

地名或街巷名称，均是一种文化现象，也是历史的一个窗口，负载着多方面的信息。图上标注的地名，不仅反映了北京城悠久的历史，也展现了城市特色和风貌。地名中还有许多与生产和商市相联系的名词，反映了地名的类型和性质以及所在地的地理（上接第 62 页）状况，使平面地图有了立体感。这一切均为考察研究北京古城发展和变迁提供了难得的史料。

《北京内外城全图》真实地反映了清代中期，北京政治、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地理概况，展现了北京城宏伟的规模和丰富的人文内涵，标志着中国古代城市地图的绘制已进入了完善和科学的阶段。它不仅是北京城发展过程中的一幅重要地图，而且也是中国地图文化宝库中一件珍贵的文物，具有多方面的文化价值。

参考资料

1. 《乾隆京城全图》，故宫博物院，1940年，影印本。
2. 《清史稿》，赵尔巽等撰，中华书局，1977年。
3. 《京师坊巷志稿》，清朱一新著，北京古籍出版社，1982年影印本。